

編後語

開始編輯本期時，正逢北京王寶森自殺，反貪倡廉之風吹遍大江南北。本期「二十一世紀評論」兩篇文章，正是討論中國國有資產轉移中的腐敗現象和有關理論問題。何清漣指出，在90年代中國土地開發熱的「圈地運動」中，大小官員肆意瓜分鯨吞國有資產，各出奇招，損公肥私，加劇了不公平的社會分化。汪丁丁則從資源經濟學理論來看，在不可遏制的腐敗現象後面的關鍵問題是產權：當前中國經濟改革的困境表明，持續十餘年的漸進改革已走到盡頭，當務之急是憲政改革。

二十世紀即將過去，檢討主導本世紀中國學術思想的規範和關鍵詞，無疑是非常必要的。何懷宏細述從世紀之交梁啟超等人由中西對比而提出「封建時代」用語，到20、30年代中國社會性質大討論中廣泛使用「封建社會」一詞，再到毛澤東出於社會動員的革命需要而論定「封建社會」的意義，就此規定了大陸史學的內容和方法。潘光哲則具體分析郭沫若在1928年大革命失敗後由文學轉入史學研究，並有意識地運用唯物史觀建構中國歷史，為現實鬥爭服務的這一過程。法國學者杜瑞樂通過對香港的個案研究發現，西方一直誤解中國的宗教。他認為，中國知識份子在下意識中也接受了西方的誤解，這種誤解甚至成為中國官方制定宗教政策的依據。因此，一個西方的幻覺變成了中國的現實。張小軍考察華南基層百姓的民間信仰後，對以儒學為核心的中國文化討論提出「儒學何在？」的疑問，進而呼籲加強對鄉土鄉民知識體系的研究。

本期多篇文章涉及傳統、現代與後現代的問題。我們在「百年中國」的編者按中，介紹了在中國文化的近代轉型中由王先謙、羅隆基和毛澤東所代表的傳統主義、自由主義和馬列主義三種趨向。從「批評與回應」四篇文章和「三邊互動」數則讀者言論可以看到，今年2月號由趙毅衡、徐賁兩文引發的有關「後現代批評在中國」的討論，是海內外學者共同感興趣的敏感話題。關鍵的問題是如何理解現代性和後現代。為此，我們向讀者推薦司徒立的文章。該文評介幾乎被遺忘了40年、而最近又備受重視的畫家德朗，他最早感到現代藝術的危機，並畢生尋找克服這一危機的新路，乃至被歷史放逐。德朗的命運戲劇性地反映出當代西方也並沒有擺脫現代性問題的困惑。

最後，我們懷着沉痛的心情向讀者報告，本刊編委、著名數理邏輯學家王浩教授因患淋巴癌於5月13日在紐約病逝。我們在本期「科技信息」簡單介紹了王浩先生的生平和學術貢獻，並謹致本刊同仁的哀悼和追念。